



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开启，专家支招——

智能信息环境 给古籍保护带来了什么？

(详见第4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国家古籍保护和数字化工程始终作为重点项目被列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古籍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方法，注入了新活力。

为总结古籍智能化前沿研究成果，展望古籍智能化领域未来发展方向，大力推动古籍工作，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目前研讨会已分别于3月12日、3月26日举办了两场。

给人文插上数字的翅膀，让技术角落照进人文之光 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2022年3月17日，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作品展”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开幕。展览共展出数字人文作品近60项，类型含可视化交互作品、视频短片、彩印海报等，主题涉及古籍智能、人文可视化、网络文学、智慧法治、历史地理、文化遗产、社会计算、颗粒艺术、课程创新等跨学科方向。作品的创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艺术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城市与环境学院、法学院、人口研究所、信息管理系等全校20多个文科、理科和工科院系。作品展将持续展出3周，至4月10日结束。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德院士，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字节跳动公司副总裁李涛以及来自北京大学20多个院

系的师生共同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王博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作品展”颇为特殊，不仅因为是首届，更因为数字人文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将科技与人文这两大领域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科获得更多的突破。他相信，拥有学科交叉传统的北京大学，同样也拥有发展数字人文学科的优势，能够产生更多相关研究成果。张志清认为，数字人文以人为本，采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方法，是工具和技术之变，思维和方法之变，学科和教育之变，敲响了当今人文学科交叉融合的洪钟，也吹响了传承和活化古籍的时代号角。他盼望北大、国图和字节在当下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拓展数字人文的未来。韩启德表示，当前，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正在取得颠覆性的进展与应用，为人文学科的创新提供了崭新的方法和工具。与此同时，人文学科不仅会应用数字技术，反过来也

会对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仅要用数字、靠数字，还要管数字。

随后，在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任王军对本次展览作简要介绍后，字节跳动公司对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发展的捐赠证书授予仪式举行。这笔捐赠将全面支持“北京大学一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的工作，研发古籍数字化平台，利用智能技术加速中华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在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以“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计算艺术史探索”为题，介绍了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近年在计算艺术史方面的探索。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教授作了“更上层楼——人工智能助力数字人文”报告，用生动的例子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从多方面助力数字人文研究。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教授作了“人工智能推动新文科建设”报

告，指出新文科的建设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助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杜晓勤教授演示了“中国古典诗词分析系统”，生动地显示出古典诗词分析系统如何在数字环境下助力古代文学的研究。北京大学智能学院袁晓如教授作了“数字人文中的可视化”报告，指出数据可视化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洞察人文数据的内涵，理解其中蕴藏的规律。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任王军教授作了“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数字人文”报告，指出需要打造数字环境下人文学科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从而才能建设智能时代数据驱动的人文研究范式。

据悉，数字人文是北京大学推进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领域，也是北京大学2022年的发展主题。此次展览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智能学院可视化实验室、艺术学院、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信息管理系等机构共同承办，字节跳动公益提供特别支持。

纳西东巴古籍文献馆开馆

本报讯 3月17日，位于云南省丽江市黑龙潭公园内的世界记忆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馆正式开馆。该文献馆的落成，弥补了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作为“世界记忆遗产”无处可体验可领略的空白，也将成为展示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以及普及世界记忆遗产及东巴文化知识的基地，为丽江“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发挥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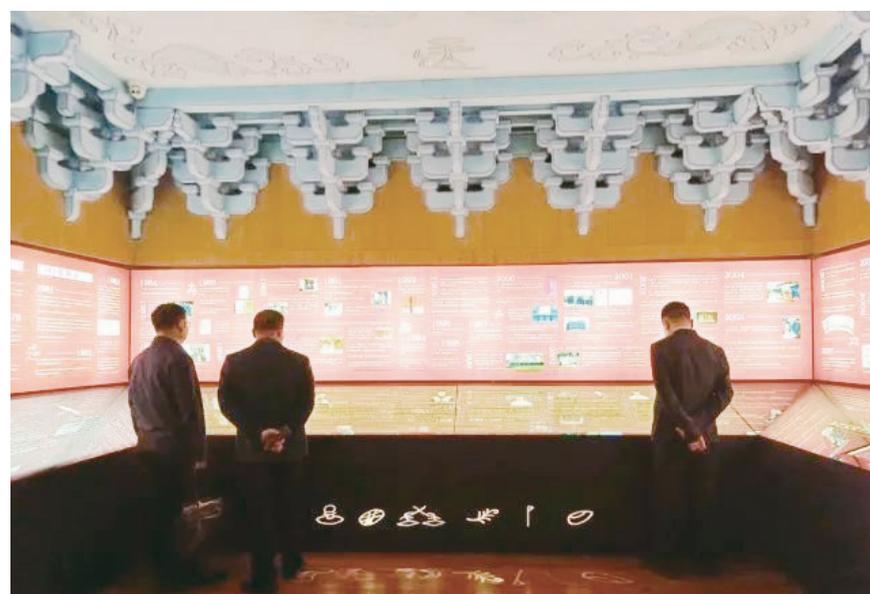
文献馆以《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为主要内容，采用图文、实物、绘画、动漫、音像等方式展示。在丰富展示内容趣味性和互动性的同时，将展、学、研、教、游融为一体，建成了了解东巴文化不可或缺的人文景点。

文献馆分为记忆遗产馆和古籍文献馆。记忆遗产馆位于光碧楼，序厅名为《永恒记忆》，用图文和视频集中展示了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申遗之路。出了光碧楼右转向东走，位于天雨楼的古籍文献馆映入

眼帘。天雨楼分为3层，一楼“象形万物，书载千秋”，让参观者认识东巴古籍；二楼“卷帙浩繁，百科全书”，集中展示东巴古籍的内容；三楼“保护研究、源远流长”，讲述人们对东巴文化的传承、利用和研究。

在这里，参观者不仅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沙画视频了解纳西族的哲学观，也可以通过视频动画欣赏精彩神秘的东巴舞蹈，还可以通过专门设置的听筒聆听老东巴的吟唱。

较之传统的展馆，古籍文献馆不仅展品丰富多样，而且互动性和趣味性十足。比如在三楼的互动屏幕前，参观者通过触屏寻找着熟悉的东巴文化研究者。据展馆工作人员介绍，里面收集了海内外百余位对东巴文化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职业不同、文化各异，却都对东巴文化充满热情。参观者点击照片，即刻就会显示关于研究者的介绍。一张张照片宛如点点星



火，让东巴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持续燃烧。

作为目前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至今保留着人类文字童年阶段的状态，是研究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纳西族东巴

古籍文献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在文献馆，这里的每一册古籍、每一份文献、每一种影像，都传递着东巴文化的灿烂和悠远。（王琨）

(上接第3版)

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开启,专家支招—— 智能信息环境给古籍保护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 王雪霞 刘晓立

智能信息环境为古籍工作带来 多方面利好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智能开发与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军是此次研讨会筹办人。他在3月12日“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第一讲中率先谈道,智能信息环境将为古籍保护带来六大利好:一是深化古典文献学研究,加快古籍整理出版;二是便于古籍文献的知识抽取和信息集成;三是加速学科跨界融合,利于高校复合人才培养;四是利于古籍阅读文化推广,提升民众人文素养;五是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用中华古籍智慧促进世界和平;六是促进政府、企业、古籍爱好者等多方协作,促成各方面、各领域的共享、开发与合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峰认为,古籍整理和古籍文献的研究与教学在智能信息环境下正面临着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凝聚多方社会力量推动古籍数字化、智能化平台的建设以及相关标准规范的形成,促进古籍资源在智能信息环境下的深度开发、利用与传播是古典文献学在智能时代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智能时代古典文献学的 机遇和挑战

中国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古代典籍是这些文化遗产最直接与最重要的载体形式,也是先贤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古籍文献属于文化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属性,必须在妥善保护基础上加以利用。古籍文献数字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

古籍智能化是当今信息技术时代人文科学新的学术增长点,亟需来自不同学科领域、拥有多元文化和研究背景的专家学者展开跨学科、跨地域乃至跨国别的协同研究。在3月12日“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第一讲中,与会专家围绕智能时代古典文献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系统讨论了古籍智能信息处理所涉及的各个子领域的发展源流、基本知识、技术架构和未来趋势,大范围普及和传播了古籍智能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谈到,大数据技术引发了文献生产的创革、文本形态的新变和知识获取的拓展,最终促进了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包括革新传统文献学的实践路径、增强传统文献研究的整体性、促进传统文献研究的实证化、催生新的研究范式等。同时,他也指出,大数据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存在着局限和问题,应警惕技术方法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以“古典文献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题,介绍了目前数字人文所涉的技术、工具、平台,探讨了传统古籍整理与大数据背景下古籍整理的异同,说明了后者在多个方面的优势,展示了智慧古籍平台的样式和使用方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晓虹从开创、进展、前景等方面对CHGIS进行了全面介绍,说明了CHGIS相较于传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优势,讨论了CHGIS对数字人文研究的贡献。四川大

学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大数据中心教授王兆鹏指出,古籍智能化的两个面向是古籍整理(文本转化的智能化)和古籍利用(功能提升的智能化),集中探讨了2.0版古籍数据库的三大进展。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金连文教授从数据、方法、应用三个方面对深度学习时代的古籍OCR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目前尚未解决或未彻底解决好的问题,强调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古籍的影响不止局限于中华文化圈,韩国庆星大学韩国汉字研究所许喆教授在跨文化视野下考察了东亚古文献数字研究的相关问题,介绍了韩国古籍数字化的有关情况,展示了具体的数据库、检索目录等网络资源,说明了所涉及的某些新技术。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刘炜研究员介绍了基于联盟链技术的古籍整理研究平台,说明了联盟链技术的优越性,展示了上海图书馆区块链平台;希望所有古籍元数据和原文永远在线,永不删除,永久保存,可按权限访问。

信息技术为古籍智能化、信息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而由此产生的古籍智能化图像识别、句读标点、命名实体识别、数字化检索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数字时代古籍研究领域新的挑战,与会专家围绕智能时代古典文献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相关探讨,对促进智能信息环境下古籍整理与研究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拓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等具有积极的作用。

古籍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带来的 转变与便利

“古籍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作为“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的首个专题研讨会于3月26日,以腾讯会议的方式在线举办。作为主办方,王军教授在开场词中表示,古籍数字平台具有基础地位和作用,在数字时代,古籍的整理与研究都依托平台展开。随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峰、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永明、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王兆鹏、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欧阳剑、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总经理洪涛、元引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朱厚权等进行了主题汇报。

此次研讨会重点对四个议题进行了研讨,分别为:对古籍数字化平台的理解、古籍数字化平台从传统数据库到结构化数据库再到智能数据库的历史溯源、相关技术工具介绍等;古籍数字化平台的使用、应用,以实例说明古籍数字平台的知识化建设模式以及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模式的构建等;古籍数字化平台的可持续化发展及商业探索;古籍数字化平台如何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会议认为,随着数字人文理念的出现,从传统古籍数据平台到智能古籍大数据平台,从数字化古籍的传统使用模式到智能化使用模式,古籍的数字化平台不仅可以实现古籍的自动校勘、自动标点、自动编纂、自动注释、自动索引、自动排版等功能,还可以提供分析、挖掘、知识服务等功能。

徐永明教授作了题为“从传统古籍数据平台到智能古籍大数据平台”的主题汇报。他首先介绍了古代文献所具备的价值与当前文献正经历的形态转变,然后通过分析传统数字古籍平台的功能和特点,讲



述了从传统数据库到结构化数据库再到智慧化数据平台的演进路径。传统数据库的缺点是缺乏后台数据支撑、关联功能差、不能定位、附加值低;结构化数据库可进行定量数据分析、定位等,弥补了传统数据库的部分不足;而如今的智慧化数据和平台以结构化数据作为后台支撑,能更大程度地解决先前的难点。徐永明教授以自己设计、建造的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为例,分享了智能化古籍数字平台的理念与实践情况,详尽展示了平台的各种功能,指出智能化古籍数字平台的“智能”表现在智能OCR、智能标点、智能标引、智能搜索、众包技术、图数据库等方面,同时需要学者们的高度参与。他表示,古籍整理任重而道远,期望智能数据平台的建设能够加快这一进程。杨海峰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古籍数字平台的演化给古籍整理带来了重大变化,还带来了思维方式和研究范畴的新变,在研究、教学的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王兆鹏教授分享了关于“古籍数字化的意义”的相关内容。“数智化”即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结合,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意义,即功能性提升与结构性转变。功能性提升意味着古籍的自动识别、自动标引及自动校注得以实现,结构性转变包括学术创新和应用的创造性转化。学术创新基于知识的贯通化发展。在此之前,知识被有序地隔开,以后则会打通——打通古今、连通各地、部类贯通,从零散到聚合。大数据会带来数据的聚类化研究,会验证、修正我们平常的知识,还可以转化为文创产品的开发。

欧阳剑研究馆员介绍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古籍基础数据应用平台实践,指出人文学者的研究模式正从读文献向分析文献转变,向基于古籍大数据的多元化、整体化研究转变。他提出了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应用模式,即将描述性内容转变为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随后,他分享了目前自己在古籍基础数据建设、文本分析和典籍知识服务实践等方面的工作。

洪涛总经理首先对“籍合网”做了简要介绍。“籍合网”是由隶属于中华书局的古联公司建设和运营的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于2018年上线。籍合网面向多类型用户,集合了多种功能,包含专题数据库、在线众包整理平台、大数据中心、自动开发工具等诸多资源。洪涛还介绍了“籍合网”的古籍智能整理出版技术研发工作、出版社编辑使用的古籍整理工作平台,并展示了古籍整理数字化的工作流程。

朱厚权总经理以“引得CBDB”平台为例,介绍了人文书籍类学术成果转化的探索与实践情况。他首先介绍了“引得CBDB”项目的建设过程及现有成果,指出数字人文平台的业态正在不断演进。随后,他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展示了自己关于目前数字人文平台体系建设的构想,并演示了元引科技为清华大学数字人文学院开发的“文本功能平台”的相关功能。他特别指出,学术研究的独创性与工程实践的可复制性既相辅相成又差异显著。

在专家讨论阶段,王军教授提出,古籍文献的数字化、结构化、图谱化,在分析过程中需要借助外部知识库,相关版权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开放的资源库、版权能否得到授权?是否可以开放API,平台互联互通?对此,专家们均发表了积极的意见,一致认为需要形成一种良好的机制,一种学界和业界良性循环的生态;需要建立平台,让大家了解学术界的成果,也使得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返回到企业,从而形成日益开放、资源有效整合的良好趋势。

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结合的 展望与讨论

如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方兴未艾。那些停留在金石、竹简和纸张上的先哲智慧也期待着能够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踏上信息技术发展的高速列车,由此产生的古籍智能化图像识别、句读标点、命名实体识别、数字化检索等都将成为数字时代古籍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本次研讨会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开展的讨论,必将为古籍传承与保护等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古籍智能”系列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两场,接下来还将陆续举办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古籍OCR技术概述与发展趋势”“古籍目录数据库”“古代年表与时间本体知识库”“古籍标注语料库建设”“古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古代历史人物数据库”“古籍资料库建设”“古典文献大数据分析”“智能时代古典文献学教育、研究与人才培养”九项专题研讨。此系列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一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主办,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智能专业委员会为指导单位,并得到了字节跳动公益的支持。研讨会通过腾讯会议举办,并在Bilibili网站上直播和回放。

清末古籍影印小记

□北京 徐蜀

印刷业主导下的古籍影印

古籍影印，是清末随着西方的照相石印术传入我国，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平版印刷术》云：“吾国之有石印术，发轫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在光绪二年（1876）。前此在宁波之花华圣经书房顾尔达（Mr.Coulter）亦曾拟办石印于中国，然未见诸事实。土山湾印刷所之首办石印者，为法人翁相公及华人邱子昂二人。然其所印者，仅限于天主教之宣教印刷品，如唱经等件而已。石印书籍以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为最先。……书商见其获利之巨且易，于是至光绪七年（即西历一八八一年）粤人徐裕子（鸿复）有同文书局之设，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用职工五百名，专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斋书画谱》等书尤其著者。（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57页）”

从贺圣鼐所述及相关资料来看，古籍影印起源于1879年的点石斋石印书局，此后的近二十年，唱主角的是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同文书局，确定无疑。这个时期古籍影印活动的主体是印刷机构，如各石印书局、书庄等，目的是

充分利用先进的照相石印设备，更快、更多地获取利润。自身没有印刷设备的书局、书庄，原以销售图书为业，此时亦跟风影印旧籍，只是印制工作需要外包，性质与前者相同。民国时期古籍影印的主体变为出版机构，例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经营者的目光更长远，专业性更强，开始重视影印古籍的社会效益，因此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印刷则沦为图书制作的一个技术环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对那个时期印刷业与出版业的关系，有过一个经典论述：

“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古昔不必说了，就现在两个大的出版印刷业说：商务印书馆谁都知道它是我国唯一的出版家，它的营业，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但是它最初是专办印刷的，所以它的牌号到现在还有‘印书馆’三字。中华书局在印刷业也占着全国第二的位置，彩印且占第一的位置。但是它最初只营出版业，不从事印刷，所以到现在仍是以书局为名。（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引自张静庐《中国出

版史料补编》273-274页）”

印刷业与出版业界限不分的主要表现，就是印刷机构大肆翻印古书。陆费逵先生接下来对印刷业印行古书的方式，作了说明：

“当时的石印书局，因自己不编译，专翻印古书，所以没有什么编译所的名称。大概在发行所或印刷所另辟一室，专从事校阅。总校一人，一定要翰林或进士出身，月薪三十两。分校若干人，举人或秀才出身，月薪十两左右。搜见到一种书，经理决定要印，便照相落石，打清样校对，校过便印订，所以出书是很快的（同上）。”

从事校阅的总校、分校，有时还要负责为翻印之书撰写序言，但落款署名的往往是书局老板。如点石斋影印本《皇清经解》序言，述该书内容、修撰历史甚详，显然不是英人美查所能胜任，却落款“点石斋主人撰并书”，还钤有“美查”之印。同文书局所印之书的序言，也经常落款为“同文书局主人”。

“自己不编译”，印什么书完全跟着潮流走，什么书赚钱快就印什么书，是印刷业做书，或者说清末古籍影印的重要特征。

清末影印古籍的特点

陆费逵先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对清末影印古籍作了一个概述：“石印业印书多而营业盛。因为科举时代携带便利的缘故，各种经书及《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一类的书，都缩成极小的版本。后来科举改革，要考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

陆费逵先生总结那一时期影印古籍的特点有二，其一是科举参考类书数量大，其二是便于携带的缩印本多，可谓一语中的。我们随意翻阅一下清晚期的有关书目即可发现，诸如《大题文府》《小题文府》《小题三万选》《小题四万选》《小题五万选》《小题十万选》《小题正鹄》《小试金丹》《四书典制类联音注》《五经备旨》《增订四书备旨》《策学备纂》《经学辑要》《增广诗韵全璧》等应试石印书种类繁多，版本丰富；史鉴策论之书，如《廿四史》《纲鉴易知录》等，各出版机构亦纷纷涉足，翻印之书比比皆是。上述图书的一大特色，便是“袖珍版式，以其便于舟车诵读”。

此时的“袖珍”书，开本小的出奇，例如同文书局光绪甲申（1884）印制的《典林瑯嬛正续编》，开本高9.5厘米，宽6.9厘米；点石斋光绪五年（1879）缩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开本更小到高9.2厘米，宽6.1厘米。此时之“袖珍版式”，已非宋元巾箱本可比。传统的中国古籍普遍“字大行稀”，版面舒朗，故早期的巾箱本书品虽小，字却不小。石印袖珍本，缩小原书开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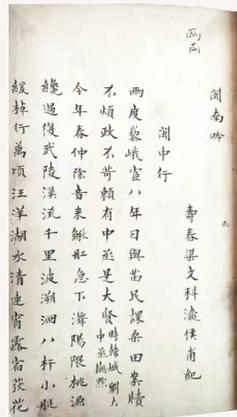
同时，有时还采用“四拼页”，甚至“九拼叶”的方式，在本就很小的半叶版面上，拼接了两个或者四个半筒子叶。书商大幅度缩印古籍的真实用意，是为了抢占市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正如醒醉生《庄谐选录》卷六所云：“近年石印书盛行，然业此者涉利为主，贪缩小则书少易售，遂至小如丝缕，因此伤目者多矣。”

清末社会动荡，法纪松弛，导致图书出版陷入无序，甚至恶性竞争的状态，作为翻印快捷便利的石印书出版，更是首当其冲。除《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大路货”，被众多书庄抢印外，号称第一盈利之书的《康熙字典》，竞争尤为激烈。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参与影印《康熙字典》的机构有点石斋、同文书局、锦章书局、广益书局、宝善书局、宝文书局、澄衷学堂、复和书局、久敬斋、鸿文书局、鸿章书局、积山书局、宝文阁、凌云阁、文盛堂书局、文星书局、文玉山房、瀛华书局、章福记书局、上洋鸿宝斋、慎记书庄、月育文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多达二十几家。其中市场行情较好的点石斋、同文书局版本，被多家书庄克隆印制。点石斋的三栏本《康熙字典》甚至被文玉山房、瀛华书局翻制成铜版印刷，后来居上。

即使是篇幅巨大的二十四史，也不乏竞争者。点石斋动手最早，于光绪癸未（1883）推出了仿汲古

阁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光绪戊戌（1898）重印；至光绪癸卯（1903）印行了《辽史》，行款相同，均为每半叶二十二行，行五十字的割裱本。因资料不全，点石斋本《二十四史》不知最终是否完成。同文书局的乾隆殿版《二十四史》，于光绪甲申（1884）面世，版式依照殿本，开本略小。同文本《二十四史》因内容完整并附考证，字迹清晰，先后被竹筒斋、上海文澜书局、五洲同文局翻印。其中竹筒斋采用逐行割裱方式，将同文本710册缩减至200册，开本有大小之分（16开、32开），至少印刷过四次；上海文澜书局更以三栏九拼页的方式，缩至80册；只有五洲同文局版式未变。另外，上海蜚英馆、久敬斋也分别影印了前四史，二者版心均标注“乾隆四年校刊”，貌似殿本，但行款差异较大，似为逐字割裱，蜚英馆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二字；久敬斋每半叶二十三行，行四十八字。

陆费逵先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提到清末影印古籍衰败的原因时说：“三十年前清朝废科举，于是石印业一落千丈。考试的书原售一、二元的，此时一、二角也无人要。大的石印书庄因考试书的倒霉，都关门了”。其实，当年石印业一落千丈的原因，固然同废科举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印刷业主导下的古籍影印，主持者目光短浅且唯利是图，又缺乏古书版本、出版专业方面的知识，注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命运。



《闽南吟》稿本

□河北 晓曦

这是一部颇有故事的古籍。十几年前，在一家古籍书店见到此本以“蓑衣裱”方式裱满拓片的“拓本古书”，店主宣称拓片如何如何珍贵，但我对“黑老虎”素无研究，碍于情面，只好装模作样翻阅一番。拓片共有两种，一是弘福寺沙门怀仁集书《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是颜真卿《东方朔画赞》，至于是清拓、明拓还是宋拓，我一无所知，只好作罢。过了许久，大概是书店常客中缺乏拓片收藏者，此书一直堆在旧书堆中，无人问津。我再见此书，品相更差了一些，部分拓片开裂或是被人揭开，露出拓片后面衬纸上的字迹，细看，是古代人诗句。我和店主商议，可否“买椟还珠”，由我请人揭裱，把拓片重新裱好送还店主，我只买里面“衬纸”。店主犹豫不决，但是已经没有了原先的心气。本来这部书就是店主以“收破烂”的价格，与其他旧书成堆成捆买来的，没花几个钱。最后，“大减价”，以较便宜价格将“椟”“珠”一并卖给我。我请李嘉波先生在京城找高手将此书揭裱重装，一分为二，成为两部古书。拓片部分至今未细研究，诗稿部分便是今天要说的“闽南吟”。

这是一位清朝官员的诗集，全书共收诗340首，按照年代先后和为官区域，可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书前有缺页，无法确知其书名，存诗134首，多记述作者在贵州、京城等地宦游感怀或与友人燕集唱和之事。第二部分书名题《闽南吟》，“寿春梁文科瀛侯甫纪”，收诗65首，多为作者在福建官场经历记述和借山水、景物而抒发的感悟、情思。这一部分最后一页题有“古寿春梁文科瀛侯甫编”，看来是准备编辑刊印。第三部分未题书名，开篇诗名“调台湾”，收诗141首，内容均为作者关于台湾人、事、景物的记述和节庆感怀。诗为同一人笔迹，写作时间自辛巳（1701年）至丁酉（1717年），跨越至少16年。涉及作者与清朝康熙年间贵州巡抚刘荫枢、台厦兵备道梁文煊、贵州学政张寄亭等人的过从交往，反映了作者官职升迁的心态和十几年官场生涯的心路历程，描述了贵州、福建、台湾等地的山水景观、风土人情和见闻趣事。

诗句韵律对仗工整，意境高远，视野独特，包含了作者处在不同环境下的心境和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如作者在闽中为官时作《怀刘大中丞》：“两番客寄夜郎乡，知遇遭逢造就长。今日张帆闽海去，戟门日远暗神伤。中丞廉洁异寻常，物阜民安度岁光。莫说南方行处好，此心终是悬黔阳。”又如在台湾为官时作《自嘲》：“闲中往事几番新，忽忽光阴叹积薪。海国云霞蒸飓浪，天涯车马困风尘。微躯岁费郎官粟，遣累常看庄子因。赢得年衰身渐老，世间幸少皱眉人”。书中诗句有校改，避清讳“玄”字，不避“弘”“宁”等字，典型清康熙朝稿本形态。查各类书目，此书无著录。

据乾隆年间范成纂辑的《重修台湾府志》记载，“梁文科，安徽寿春人，正白旗举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任台湾道，五十七年（1718）升广东按察使”。从诗集内容可知，梁文科曾任京官，任过贵州思南县知县等职，辛巳年（1701）“升闽中副使”，乙未（1715）“调台湾”，丁酉（1717）“特擢粤东臬使”（与《重修台湾府志》记载有差别）。有著《集验良方》传世。其胞弟是康熙六十年（1721）任台湾兵备道时在“朱一贵事件”中弃职潜逃后被朝廷问斩的梁文煊。

近日翻出此书研究，真想弄清楚是何人何时为何将此书作了拓片的“衬纸”？有书友见到揭裱出的拓片，提出以高于我当年购买“全书”的价格购买。如此看来，“零成本”收藏此书已成为可能。

2022年年初，兰州大学图书馆接受一批来自谷苞先生家属捐赠的手稿、读书笔记等珍贵文献资料，再加上之前已经入藏的两册谷苞先生捐赠的论文稿，构成了图书馆丰富且有特色的学者珍藏。对此，兰州大学图书馆在善加保护的同时，还计划进行相应的展示和探究，以传承古苞先生学术精神、弘扬兰大学风，可谓图书馆馆藏建设及挖掘利用的一次有益尝试。

谷苞先生家属向兰大图书馆捐赠珍贵文献资料

□谭黛丽 兰州大学图书馆

谷苞其人

谷苞（1916—2012），甘肃兰州人，祖籍湖南。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度休学回兰，后于1939年转赴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师从陶云逵教授研习人类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一度在社会科学研究室跟随费孝通先生从事社会调查工作。1944年回到兰州，任甘肃学院、国立兰州大学讲师、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新疆工作，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副院长兼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院党组成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委员等职。退休后定居兰州，受聘为兰州大学客座教授、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学术顾问。平生著述丰富，主要有《民族研究文选》《故土新知》《新疆历史与社会》等十余种。

谷苞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族理论、民族文化交流史、农牧区经济和社

会结构。近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大背景下，谷苞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论述再次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谷苞与兰州大学的渊源

谷苞先生与兰州大学渊源深厚。1927年，谷苞从兴文小学转入兰州中山大学（兰大前身）附小就读。1937年北平被日寇攻陷后，当时在清华大学就读的谷苞回到兰州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于1938年受聘为甘肃学院（兰大前身）附设小学四年级级任（班主任）兼教员。从1944年开始，谷苞先生又先后在甘肃学院、国立兰州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开设民族学和社会学课程。在兰大期间，谷苞先生一度在甘肃农牧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946年，他利用半年的时间，到洮河流域和白龙江上游的藏族农村、牧区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1948年，他又与同事一道在甘肃山丹、秦安和会宁等地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社

会调查。1949年兰州解放后，谷苞先生从兰州大学参军并随军进入新疆，后来长期在新疆工作，离休后重回兰州定居。1985年，他再次受聘为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学校培养民族学研究生。

纵观谷苞先生的一生，他一度在兰大求学，又三度受聘于兰大，为兰州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019年兰州大学庆祝建校110周年之际，学校隆重推出旨在再现本校辉煌历史的《兰大百年萃英文库》，谷苞先生早年的著述精选集《故土新知》作为首辑八种萃英大先生代表作之一入选其中，其书对于构建新时期民族学学科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谷苞系列文献资料入藏兰大图书馆

1月11日，兰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宋戈一行前往谷苞先生之女谷风老师家中，接受谷风女士代表家人捐赠的谷苞先生生

前手稿、读书笔记等珍贵文献资料。

全部文献资料具体包括以下五类：手稿，包括《谷苞自传》《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古代龟兹乐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等多种；读书笔记，包括谷苞先生研究古代新疆音乐与舞蹈的读书卡片200余张；书信，有国家原副主席王震同志致谷苞先生书信1封（复印件）；照片，包括顾颉刚先生与谷苞在兰州的合影等照片5张；著作，包括《民族研究文选》《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林则徐在新疆》等13种，涵盖谷苞先生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述。

谷苞先生生前多次在兰州大学担任教职，为学校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谷风女士及家人捐赠的这批珍贵文献资料入藏图书馆“兰大文库”，这是传承先生学术精神、弘扬兰大学风的良好契机，对图书馆馆藏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部特殊的赠品文献

□韩春平 兰州大学图书馆

在兰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特殊的短篇论文集。文献分上下两册，每册都加装了黑色硬纸封皮，封面没有任何文字信息，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书页和内容方面：书页均为空白朱丝栏罗纹纸筒子页，内容则是粘贴于筒子页之上的已发表论文剪报，且剪报文字有不少修改之处。这种附加了修改的剪报文献，本身就是馆藏中的罕见之品，其来历更是不同寻常，它是剪报内容作者、著名学者谷苞先生当年奉赠国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先生，专门用以请教的一部学术论文合集，后来被交付学校图书馆收藏。

论文集上册包括内封、目次和正文三部分，下册全部为正文。在上册内封面，有如下三行毛笔题字（竖排）：

树公校长赐正

晚 谷苞敬赠 十月二十日

卓尼番区调查之一部短篇论文

“树公校长”是对辛树帜校长的敬称。辛树帜（1894—1977），字先济，湖南临澧人，著名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古农史学家，1946年至1949年曾出任国立兰州大学校长。“十

月二十日”所对应的年份，经考证应该是1947年。所谓“卓尼番区调查之一部短篇论文”，可以看作是对两册论文集的总体命名。“卓尼”是甘肃南部地名；当地从明代开始长期由土司统治，民国年间创立了国家行政建置——设治局，与土司共同治理，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设立卓尼县，隶属甘南藏族自治州（此前卓尼辖境广阔，不只囊括今甘南州大部分地域，还延及多个周边地区）。“番区”在此是指藏族地区。

目次为各篇论文题目编排了序号，共计有十二篇，又具体分为三组，第一组六篇，后两组各三篇。这些论文是青年谷苞在其执教的兰州大学资助下，于1946年秋冬之际前往洮河流域和白龙江上游藏族地区开展社会调研的结果，其中前两组已于1947年在多家刊物上发表。

第一组六篇论文仅罗列文章题名，依次为《甘肃番民的支派及其分布》《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汉族退出叠州的一种解释》《汉族定居于卓尼番区的途径》《卓尼番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和《记洮源三城》。目次随后特别注明：“以上六篇收入本集”，意思是六篇论文均被收入两

册论文集，这也与论文集实情相符。经考察，这六篇论文均发表于兰州当地刊物，其中《和平日报》（兰州版）三篇，《西北论坛》两篇，《北辰月刊》一篇。

第七至九篇为第二组。与前六篇不同的是，这三篇均发表于外地刊物，相关登载情况在题名之后均有括注说明。三篇论文分别是：《为筹边者忧》，载《中国边疆》南京复刊号；《饥馑中的富丽》，载上海《光杂志》；《叠番男女》，载北平《经世日报》。目次有相应标注称：“以上三篇仅存分，未收入本集。”据此可以推知，登载前面六篇的刊物在作者手头应该存有复份，让他得以剪裁、汇集复份资料并呈赠于校长。

第十至十二篇为第三组，依次为《甘肃边区中的边民生计问题》《选条走得通的路吧，我们的边疆教育》和《卓尼的汉番》。目次注称“以上三篇尚未发表”，不过在《卓尼的汉番》之下另有括注写道：“稿存顾颉刚先生处，可于《边疆》月刊三期发表。”所谓《边疆》月刊，也就是前述在南京复刊的《中国边疆》杂志。除《选条走得通的路吧，我们的边疆教育》是否发表目前尚未考定外，其余两篇经考察后来均已正式发表。

关于正文内容亦即相关剪报，作者对多处地方用钢笔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包括订正文字讹误、添补标点符号、增删相关表述等，甚至还有对一处论文题目改头换面的处理。目次所列第四篇《汉族定居于卓尼番区的途径》，据剪报可知原本题作《汉人怎样的定居于卓尼番区》，在剪报中被直接修改为与目次一致的表述。此外在《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中，还有两处添补内容直接使用了藏文字丁，要知道各篇论文原本都完全是用汉文写就。需要说明的是，谷苞先生不仅熟悉藏族社会历史，而且精通藏语。

谷苞先生的这部论文集，由于书页和内容的特殊性，更由于它是当年谷苞先生呈送辛树帜校长的赠礼文献，早已成为兰州大学的馆藏珍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2月24日，谷苞先生之女谷风女士和女婿胡建成先生受邀专程到学校图书馆参观了藏品，对能够在七十多年之后看到其父当年的赠品和手迹感到惊喜。对于这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图书馆方面除了善加保护外，后续还将进行相应的展示和探究。

《民国文献研究》征稿启事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艺术等方面的文献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承载了那个时代的记忆，也独具史料学及文献学价值，其现实资鉴意义也不容忽视。为有效保护民国时期文献，2012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在文献普查、征集、整理出版、专题资源库建设、宣传推广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工作。10年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为进一步做好“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各项工作，及时反映民国文献保护、整理、研究、利用等方面的学术动态，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联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聚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时代主题，创办学术集刊《民国文献研究》。每年计划出版两辑，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具体栏目如下：

红色文献研究

以红色文献（革命历史文献）为特定对象，开展党史、革命史研究，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物，苏区及根据地、解放区文献等。

新史料解读

披露新发现或学界关注较少的日记、手札、档案等，以及其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或文物价值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解读及学术研究。

民国出版史研究

侧重于民国文献的出版机构、出版人、出版活动、出版物、出版印刷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民国文献保护研究

对民国文献的原生性和再生性保护技术、保护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民国文献编目研究

对民国文献的著录规则、专题目录编纂、检索、利用、解读等方面的研究。

专题民国文献综述

对某一类专题文献进行搜集、梳理、分类、分析和总结，对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等收藏机构的专题馆藏进行介绍和研究。

民国文献整理动态

发表民国文献年度整理出版的动态消息、数据统计、分析报告，包括专题影印、点校出版、研究动态等方面，并择优发表与民国文献相关的书评资讯。

《民国文献研究》征稿工作即日启动，第1辑计划于2022年8月出版，16开本，欢迎学界同仁踊跃投稿。为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与水准，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来稿须知如下：

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严把好意识形态关口，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2. 注重学术性、创新性，要求内容充实，具备问题意识，探索传播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
3. 稿件字数一般控制在2万字以内，重要文章可适当放宽。
4. 遵守学术规范，文责自负，不得出现抄袭、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
5. 本刊收到稿件后，在3个月内完成审稿工作，若3个月未收到采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6. 所有来稿均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一经刊用，即按通行标准支付稿酬并赠送刊物2册。

《民国文献研究》编辑部
2022年3月25日

联系人：李强 电话：010-88003161 邮箱：mgwxjy@126.com